



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第一辑）

总主编 蔡翔

论出版的文化自觉

A Research on
Publishing'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张雨晗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第一辑）

总主编 蔡翔

论出版的文化自觉

A Research on
Publishing'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张雨晗 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出版的文化自觉/张雨晗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6. 12

(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 / 蔡翔总主编)

ISBN 978-7-5657-1602-7

I. ①论… II. ①张… III. ①出版事业—文化史—研究—
中国—近现代 IV. ①G23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7701 号

论出版的文化自觉

LUN CHUBAN DE WENHUA ZIJUE

著 者 张雨晗

责任编辑 赵丽华 唐 颖

封面制作 泰博瑞国际文化传媒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17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602-7/G·1602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改革是出版发展的唯一路径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 蔡翔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期发布了最新的产业分析报告。从“十二五”期间的产业数据看,我国出版业呈现出良性发展态势,且不乏亮点和拓展空间,再次增强了我们的士气和信心。“十二五”期间,图书出版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且年年增长,2015年达到822.6亿元,5年增幅达261亿元,增长了46.4%。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势头强劲,作为新业态的数字出版五年增长了318.7%,且每年增速超过30%,已成为增长最快的板块。出版业整体资本实力显著增强,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资料,我国出版业投融资能力已稳居世界第一位,在跨国兼并中,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主力阵营。从以上这些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的文化产业建设中,出版产业堪称中流砥柱。出版产业做不好,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就有可能成为空话;只有出版做强做大,文化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我们亲历并紧密关注出版业发展,是出于产业思考,更是出于文化情怀。出版作为内容产业和文化事业,是人类知识积累和传承的重要力量,寄托了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理想和情怀。出版传承文化的本质不会随着时代更迭和技术变革而发生变化,其本质与产业化运营并不相悖,产业是出版的载体,产业化运营是出版更好发挥社会功用的引擎,这已经被

过去十几年我们出版业翻天覆地的变化所验证,也是身处其间的我们真切感受到的。

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发展文化产业,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把文化产业发展成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我们的出版管理部门敏锐地捕捉到改革对于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重大意义。以柳斌杰署长为代表的一代改革派,在其后的十年间,和支持者、同行者们一起,坚定地拉开了改革的序幕,推动了中国出版市场化的进程,有力地提升了文化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活跃度和话语权。

如今回首,从时间进程上看,这十年的中国出版体制改革具有渐进性特点,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2003年,国家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出版体制改革拉开帷幕。2005年,随着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出版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展开,并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在出版全行业不断深化。改革不仅有路线图,更有时间表,始终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例如,国有经营性出版单位相继有序实现转企改制;又如,出版行业突破障碍开展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并购重组,经此催生的大型出版集团和企业开始尝试上市融资,运用资本的力量不断提升市场地位……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增强了改革的攻坚力度,使改革总体上保持着积极稳妥、有效有序的态势。行至2011年“十二五”开局之时,全国581家图书出版单位除四家公益性出版社和部队出版单位外,地方、高校和各部委出版社基本完成转企改制任务,正式成为市场主体,走出与市场接轨的关键一步。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际,原定十八大前完成的改革目标基本如期完成。

2002年至2012年间的改革成果丰硕,为中国出版业开拓了全新的局面。首先,改制帮助出版企业确立了市场主体地位,经营活力得以激发,出版生产力得到释放,全行业发展动力强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统

计表明,2012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出达1.6万亿元,而作为改革试点起始年的2003年这一数据仅为3000亿元,改革十年,产值提高了5.33倍。其次,改制推动了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市场逐步成为配置出版资源的主要手段,出版业跨区域、跨媒体的资源整合不断深化,战略性重组所培育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产业地位突出,竞争力越来越强。2011年年底,全国已组建出版集团33家,其中不乏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这样的百亿级产业航母。再次,改制使中国出版业探索资本化运营的勇气和信心不断增强,驾驭资本力量的手法也越来越娴熟。这一过程中,资本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出版业各个角落,提升着中国出版业的活力。无论是上市融资,还是战略重组,资本越来越成为中国出版业得心应手的武器。而最后,最能激发中国出版人激情的是,改制使中国出版业开始放眼世界,坚定地迈步“走出去”。国际化是中国出版业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向,事实上,这也是改革后产业强大带来的必然结果。

2012年是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分水岭。虽然中央确定的十八大前的改革任务至2012年年底已完成,但改革并没有就此停步。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文化领域发展提出了“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的新要求,中国出版业要实现这种优化升级,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出版生产力。2002年至2012年仅走完改革的第一阶段,为我们出版业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最大程度扫清了“拦路石”,但束缚出版生产力的因素依然存在。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出版人以更大的信念、勇气和魄力破解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其时,我们抱以最大热情的出版业伴随改革进程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引发不少争议甚至非议,需要我们正本清源、继续前行。

所有的矛盾、问题、争议、非议,归结起来在这几个方面。其一,产业发展初期重规模轻质量的做法给我们出版行业带来很多泡沫,如在我相对熟悉的学术出版领域,推出了不少平庸之作乃至垃圾作品,引发整个学

术共同体的不安。必须解决发展是追求规模还是追求质量的矛盾,质量优先的发展方式才是可持续的。其二,出版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还不够强。由于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限制,目前很多出版企业产权改革仍不到位,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其三,我们的法律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大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成,致使产业资源配置难以进一步优化,出版业资本运营遭遇瓶颈。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出版在当今世界出版格局中仍“大而不强”,我们现在的作品还不能进入具有世界影响力作品的行列,还不能用触及人类文明根本的话题引发世界的共鸣。在看到出版业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冷静审视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继续拓展前行之路,是我们出版人的使命和义务。我们都有一个共识: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有发展;改革难免遇到问题和挑战,也正是改革让各种矛盾和问题愈加凸显,问题的背后往往潜藏着深刻的制度根源,而改革遭遇的问题恰恰只能通过深化改革、继续发展来解决。

改革是一代出版人的事业,只有置身于改革历程中的人,才能体味它所带来的诸般况味,有荣耀有光环,也有误解和遗憾。达成通过改革谋发展共识的“我们”,是这十几年出版改革的亲历者,包括新闻出版总署、各出版传媒集团以及出版研究机构有远见的领导们,他们曾是出版改革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深入思索出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专家和学者。“我们”也有着中坚一代的成员,积极参与了出版改革的进程,并且正在后改革时代,主持和推动着出版产业的优化升级。“我们”还有出版学界培养的大量年富力强、充满创造力的年轻学人。

出版就是这样一个产、学、研息息相关的行业,理论积极指导着行业实践,行业变迁不断修正着我们的理论,形成了有机、良性互动的生态。作为柳斌杰先生的弟子,我很荣幸在先生指引下,主持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并创立了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比较全面地

参与到 2002 年至今的出版改革进程中。前者的市场化进程开启于 2002 年,后者则创立于 2004 年,十数年来,两者从不同角度见证了中国出版业的凤凰涅槃,自身也因侧身其间得以不断成长和壮大。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地处首都、背靠传媒,有效整合了政府、学界和业界的优势资源,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人才培养和决策参考的一块高地。我们的导师团队,汇聚了近三十位充满改革意识和创新思维的新闻出版界元老、出版传媒集团新锐领导以及出版管理机构、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他们和中心的硕士、博士、博士后一起,形成了学界、业界有效联动的学术和产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一直以客观辩证的眼光,对中国出版改革进行着系统总结、剖析与反思。

这套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是中心的阶段性成果,被推荐列为 2015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原中国出版集团总裁,现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先生在推荐语中称:当下的中国出版业机遇和危机共存,要实现从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的转变,需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出版产业发展路径。“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项目直面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出版产业政策调整、当代出版文化等重大前沿问题,多视角、全方位地为中国出版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原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先生也对丛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丛书内容系统、全面,涵盖了出版产业政策、产业转型、投融资、技术创新、国际传播、数字出版、媒介融合、文化自觉、大学出版等热点问题,是一套具有完整意义的出版产业观察丛书;同时,丛书并不止于产业研究,更从文化的角度诠释了中国出版业对人类、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作为主编,我很欣慰地看到丛书的正式推出,也很感谢两位前辈的支持和推荐。我们中心将陆续推出丛书的第二辑,第三辑……不断跟进、记录并反思中国出版改革以及优化升级的进程,并以更为客观的视角和理性的积淀为此进程源源不断地贡献力量。目前第一辑的

作者大多还是中心的博士或博士后,他们都很年轻,普遍缺乏行业的历练,看问题的辩证性还有所欠缺。但他们的优点也很明显,没有桎梏、思维活跃、有跨学科背景、有国际化视野,是我们出版和文化产业研究的新鲜力量。丛书中《当前出版企业转型问题研究》《出版传媒上市公司投融资研究》《中国出版产业政策研究: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建构》《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研究》等都是对中国出版体制改革的客观观察,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出版变迁与转型》《自出版管理问题研究》《中国数字出版内容国际传播研究》《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研究》等都能在相对开阔、与国际出版市场和评价体系对接的语境中谈论中国问题;《论出版的文化自觉》《大学精神与大学出版:民国时期“学人办刊”研究》则史论结合,从出版本质、出版价值这些更为根本的视角,以史为鉴,对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的走向提出一己之见。

我很珍视丛书体现出的朝气和活力,我们的出版产业也正需要以这种朝气和活力不断推陈出新,打好深化出版体制改革、融合发展、内容创新的攻坚战;按照十三五的规划,建成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文化公共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六大”体系。在此过程中,值得关注 and 深入分析的问题还很多,包括公共服务体系如何建构、融合发展如何真正落实、学术出版机制如何调整、社会化出版现象如何看待、出版传媒法制建设如何推进、资本市场如何突破体制壁垒,等等,“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研究”丛书后续将陆续推出同人的思考。我期待丛书真正成为一个开放性平台,聚合起更多同行者的力量,为出版行业、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和思想动力。我们的出版产业改革一直“在路上”,我们的研究和行业观察也会一直“在路上”。

我们到底在追寻什么？

——为《论出版的文化自觉》序

蔡翔

雨晗的博士论文将成书出版，要我写序。我入出版学科，起步较晚，水平不高，常说自己是野战军但态度端正以自嘲，所以对作序这种需举重若轻、高屋建瓴之功力的大事，常避之不及。但作为她的博士导师，推不过。

这就想起，当初雨晗为什么要读博士，以及为什么要选这样的题目。

三年前雨晗准备考博时，已过而立之年，结婚生子，夫妻恩爱，家庭其乐融融，而且她先生的事业也是顺风顺水。对于其考博动机，我怀有极大的疑虑。但她几句话下来，却让人洗耳起敬：我生性简单，爱读书，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所以硕士毕业我选择了出版。我在地方人民出版社已经做了9年的编辑，一个小编，在出版转型和市场改革的大潮中搏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编自己不想编的书，望

不着边际,十分痛苦。痛苦无解的时候,就想到再去读书。

我由怀疑到好奇,到后来她的表现让我由好奇到感动。雨晗不但高分考了进来,而且全日制真正驻读,师生一起认真对待每一个出版案例分析,全身心投入每一个出版项目攻关。至博士开题时,我对她说,以自己作为出版人的痛苦求解为题吧,定“出版是什么”。她犹豫却无退缩:老师,我不是历史科班出身的,恐把握不了;那换个角度,“论出版的文化自觉”怎么样?

“论出版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大题目,让一位年轻博士生来写,难度很大。雨晗知难而上,坚信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用她自己的话讲,在过而立之年离开家庭、放下自己心爱而又心存困惑的编辑工作,负笈北上攻读出版专业博士学位,是想追问出版的本质,也由此追寻生命的价值。

作为导师,我要感谢雨晗的坚持和努力,也很珍惜师生问答、共同求索、互相促进的这段时光。在出版行业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可以说我和我的同行们把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个事业。我们感受过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场面,也亲身体验过寂寞郁闷和不被理解,如今更是被裹挟在扑面而来的技术革新和体制变革浪潮中。出版到底是什么?还有什么价值?到底该往哪里走?这些问题也时时困扰着我们这一代人。

一、我们缺了什么?

这十多年,我们的出版事业一路高歌猛进,码洋不断翻番,报表、

数据也越做越好看。如今一年能生产 40 多万个品种，新书品种更迭的速度相当快。但是，同行聊起，却不觉得带劲，甚至内心有倦怠，感觉缺了什么。聊起我们的出版生涯，意气风发的时光往往上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讲，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当编辑，系统引进了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等著作，先生学贯中西而又能深入浅出，一时洛阳纸贵，那种出版和阅读的热潮至今令我自豪和感动。还有一件出版盛事：90 年代中期我和同学孔德龙作为出版策划，有机会主持重修《中国大通史》，洋洋洒洒几十卷，当时张岱年、周一良、季羨林、锺敬文等老前辈那么热情地给予支持和鼓励；举国上下几百位专家，不给任何车马费劳务费，汇聚一堂，众志成城，认真讨论纲目。这种场景，现在想来依然激动不已。我们确实深爱出版这个行业，但如今，扪心自问，我们还能得到多少来自作者和读者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支持呢？比我们更年轻的从业者，他们的职业成就感又从何谈起？

我们的出版到底缺了什么？雨晗的立论很清楚——缺了文化，缺了精神，缺了文化自觉。她从梳理、建构中国近现代出版的“文化自觉史”入手，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对现实的困惑进入历史，花了整整四章的篇幅去谈近代出版业、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以及近代出版理念闪耀的文化自觉观念。她认为：近代中国文化自觉所蕴含的文化启蒙、批判和重建，为出版提供了厚重的思想土壤和博大的社会市场；中华民族之所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就在于一定程度上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全面而彻底的文化自觉是文化转型和民族新生的先决条件。

这些立论都是准确的,只是有些书生气。由于缺少专门的近现代史研究背景,雨晗论述中的一些观点和对具体人、具体事的看法,难免有些隔膜。我是学历史专业的,看到了这些缺憾,但我很欣赏雨晗的学术锐气和勇气,不忍打断她的学术激情,那是一份沉浸于近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时获得的书写冲动。这样的好处在于抛砖引玉,引发我们整个行业的思考。恩师斌杰老署长生日聚会时,他的博士学生二十余位聚集一起,畅谈出版理想。师妹陈洁刚从剑桥访学归来,她说在英国根本感受不到什么数字出版,大家读书、谈书或者教书,一如几年甚至几十年前,不紧不慢。在牛津、剑桥的书店,英国人的阅读神情还是几十或一百年前的样子,历史似乎凝固了。但是在那里很难看到东方人或者黄皮肤,倒是在繁华热闹的伦敦街区,满眼都是中餐馆和中国人。听到这番话,我内心有触动,更觉得现在讨论“文化自觉”非常必要。

二、我们要追寻怎样的文化?

这本书带我们到中国现代出版的原点去思考出版的本质,追问文化的内涵。什么是文化,我们现在所要追寻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呢?书里提到的张元济、高梦旦、胡愈之、邹韬奋这些出版家的文化理想,包括视文化为“国是”“国本”“国魂”,认为出版要以“文化立人、文化立国”,要“团结作者、服务读者”等,其实我们这些年也都在提。只不过他们当年的“文化力”概念,现在换成了“软实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强国”这些更为恢弘的口号。可以说,在理念层面,我们的

文化自觉可能比之前的百年都更强烈一些，我们的国家和知识界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于“文化强国”有如此共鸣。可是，看当下出版的作品、产出的文化，我们为何感觉不带劲，不满足？

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什么？它不是口号，而是由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营造起来的一种氛围和慰藉人心的精神力量。古希腊精神、文艺复兴、狂飙突进运动、汉魏风骨、盛唐气象，它们的文化感都是由一篇篇有特色的文章、一个个有意思的人、一件件有味道的事情，以及一段段闪光的思想积累起来的，这些细部构成了文化的机理。缺乏这些耐人寻味的机理，缺少稳稳当当的作品，文化的大厦是不扎实、无特点的。我们这些年在理念、口号上阐发的不少，花了不少功夫描摹蓝图和愿景，能静下心来，不计一时得失做点文化积累工作的少，总是一副出急活和快速向文化强国进军的姿态，难免浮躁和不稳当，远离文化的真义。

再问文化是什么？雨晗开篇第一句说得很好：“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世界。因此，对文化的关怀就是对人自身的关怀。”确实，文化本质上是对人的关怀，关怀作为整体的人类的休戚悲欣，悲悯于人性本身的善与恶。从理性层面讲，文化必然产生于一定的体制、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中，和制度设计、权力机器有着千丝万缕、循环共生的联系，不可能脱离现实。但是，能传承、能凝定和沉淀下来的文化因子往往是有一种内在超越性的，关注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能超越一时一地、超越一己之私、超越制度设计，甚至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疆界，令处于不同时空的欣赏者都心生感动。细数撼动人心的经典作品，概莫如是。我们出版文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

宿也在这种对人的关怀中。

制度设计、意识形态与关怀人性并非对立关系,很多时候是相互促进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是我们国家摆在首位的治国理念,这完全是可以推动伟大文化、伟大作品产生的制度设计,可惜我们对“人”和“民”的理解表面化、形式化,远未达到人性、人格、尊严和命运的层面。而近代优秀的出版企业、出版家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精心培育的“立人”语境中,真正把握住了文化和出版的方向,有志向、有定力,脚踏实地做了造福几代人的文化积累工作。我们如今要追寻的文化,应该正本清源,眼光放远些、放高些,往真正“立人”的方向走。

三、作为文化生产主体的知识分子如何自处?

这本书最后一章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从历史回到现实问题和当代中国出版时,写作缺了几分自信。这是雨晗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些出版人乃至文化人共同的问题。在应对现实的焦虑时,我们上下求索,往往试图到历史中挖掘、美化所谓的“黄金世界”,但那些“黄金世界”好在哪里,哪些因素可以为今所用,并和我们的现实处境有效嫁接,论述起来语焉不详,回到现实问题,大家往往叹口气了事,来一句“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于事无补的。

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追问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不管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都是文化生产和推动的核心力量,即便在人人能自助出版的出版行业,真正能凝定的文化还是出于这个群体。

雨晗对近代出版人的论述是到位的，她认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以近代出版业为平台，更与出版的现代化同步，不管是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等传统知识分子，还是胡愈之、邹韬奋、茅盾等现代知识分子，都有将自身作为“社会的良心”这种身份自觉，出版的理想化状态也由此生成。那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包括出版人，又处于怎样的境况呢？有两个方面我们必须考虑进去，一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产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对不平衡；二是互联网时代抹平一切的力量。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毋庸置疑改革开放是一项福泽全民族的伟大设计，也毋庸置疑市场经济内含的“仓廩足而知礼节”的正确逻辑，但是反躬自问，作为最有可能超越一己之私、超越利益驱动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做得不够好，在市场化、商品化、物质化潮流中全然卷入，主动或被动地日益远离理想主义情怀，甚至参与到放大市场经济之“恶”的力量中。我们一些编辑、一些出版人，一边抱怨读者功利世俗、趣味低下，一边采用各种恶俗手段煽动、操纵读者消费需求中最消极的层面，实在令人汗颜。就第二个方面而言，互联网时代抹平一切的民主和平等意识是一把双刃剑，在人人可传播可发声的情况下，难免泥沙俱下、良莠杂陈，很少有受众能耐心甄别、有耐心接受启蒙或说教，传统知识分子想成为“社会的良心”往往不可得。我们的出版也有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大众面前集体失语的趋势。这些都是近代知识分子没有遇到的新情况，我们如何像前辈那样坚守知识分子的责任、精神和良知呢？这是包括出版人在内的知识分子需要自我追问、自我求解的。有一个共识需要坚守：如果这个群体丧失了傲骨和精神，丧失了

仰望星空的能力,无法成为引导社会求真、向善的正能量,所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强国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讲,即便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们没办法“兼济天下”,起码也应该“独善其身”,各自守住职业精神、底线和良知。回到出版领域,不出或者少出垃圾书、庸俗书、应景书,应该是我们的底线和良知吧。

雨晗这本博士论著也许并不完美,但它夹带着自我救赎,引领我们进行了一次出版和文化的朝圣之旅,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中也产生几丝“文化自觉”,向内心追问平时视而不见,甚至根本未见的问题。我们个人,我们的出版,我们的文化,乃至我们的国家现在都需要这样的坐而论道。

是为序。